



從德國經驗看轉型正義

- || 議 程 107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1530
- || 地 點 松山菸廠
- || 主持人 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 || 講 者 耶朋曼 (Rainer Eppelmann)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董事長
格林堡 (Dr. Robert Grünbaum)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副執行長
- || 與談人 花亦芬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員**

議 程

- 1400-1405 主持人開場
- 1405-1430 轉型正義基金會董事長 Rainer Eppelmann 分享
- 1430-1450 轉型正義基金會副執行長 Dr. Robert Grünbaum 分享
- 1450-1500 與談者花亦芬教授回應
- 1510-1525 對談時間

主辦單位：不當黨產委員會

協辦單位：沃草 Watchout

從德國經驗看轉型正義

林佳和

請耶朋曼董事長與我們分享德國處理不當黨產的過程，以及在這 16 年間德國社會的反應。

不當黨產處理的德國（東德）經驗

耶朋曼董事長

各位貴賓好，非常高興有這麼多來賓、媒體朋友關心這個議題。今天到場各位的關注，強化了我對台灣民主的信心。這是我第三次造訪台灣，第一次是在 2000 年，第二次是 2008 年，2018 年是我第三次造訪台灣。過程中我見證了台灣民主發展的穩定。做為過去在東德政權下生活的人，經歷了只有一個政黨掌控所有權力管理整個國家的事務，從我出生到我 46 歲，一直活在這樣的獨裁政權下。這個獨裁政權在 1961 年 8 月 13 日硬生生的把德國切成兩半，建立了一個邊界圍牆，讓東德人民無法再到自由的西方國家去旅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東



林 佳 和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耶 朋 曼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董事長

民主與獨裁本質上的不同，民主得來不易，因此「記憶」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使命。

德人民必須要走上街頭抗議，呼求改變這不義的政權。這道路相當漫長，但也來得很突然，在 1989 年到 1990 年之間，東德發生了沒有暴力的革命，我們稱之「和平革命」。東德人民要求了解過去獨裁統治的 40 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並要求東德統一社會黨 (SED) 官員必須下台。在政權和平轉移時，相當多的黨內高級幹部與領導者切割，企圖尋求黨與個人未來發展的可能。在 1990 年 3 月 18 日，東德進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民主選舉，而民主選舉後成立的政府所做出的決議，就是要東德政權必須把不義、不法取得的財產重新交還給國家。當時要求 SED 必須向大眾公開說明擁有的財產中，有哪些是透過不法途徑取得。而這些不法取得必須以公共利益的型式交還給國家。SED 將他們合法取得的部分告訴社會大眾，使他們能繼續合法擁有，至於那些無法提出具有證據的部分將還給國家。這個公開調查直到 2006 年才結束。我們知道 SED 並沒有將所有不法取得的財產還給國家，他們試著救回一些以犯罪取得的財產，繼續為己黨所用。調查黨產的過程常常是隱沒在模糊的情況下，必須藉著法律訴訟的方法追回黨產。

會議 記錄

這些黨產不是在一個國家，可能是在奧地利、匈牙利、瑞士，因此這些法律訴訟必須和各國的機關進行合作調查。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收歸國有的數百萬歐元黨產並不是單純的交給國庫，而是必須有目標、有計畫的運用，重新回到前東德的人民手中，回到對他們有用的地方。這些錢用在不同的計畫上，像是用在支持年輕人的工作、文化工作、用在交通基礎建設（道路、運河）等對東德人有益的計畫上。德國不當黨產調查委員會在 1990 年成立，1990 年年底德國統一，當時德國人民對 SED 的財產狀況、國家安全局的檔案有相當大的興趣。跟大家一般的認知不同，這個國家安全局主要是針對國內人民。許多人必須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只因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當局不同，就受到懲罰、拘禁，例如他們的孩子無法像其他順從政

府的家庭一樣，享受同等的待遇。許多受害者希望知道當時國家安全局對他們做出什麼樣的調查報告，導致他們蒙受損失。過程中重要的是法治原則，在調查過去檔案的程序必須符合法治國原則，必須避免這樣的調查與立法是報復性的。當初許多的東德人民並不是單純的走上街頭，是至有人直接占領國安局，因為當時國安局的人試圖銷毀檔案，東德人民必須阻止他們，因此今天還有很多國安局的檔案能夠被保持住。依據德國的法令，所有人都有權利查詢國安局是否有自己相關的資料，若真的有資料，他們也有權利去看這些檔案。當時成立的第一個機關是清查不當黨產委員會，他們的工作是去調查有多少不義取得的黨產；第二個機構是負責讓人民有權利去了解他們的檔案。但在 1992 年，德國國會認為就上述兩項機構不足以促進人民處理東德獨裁的過

去。在 1992 年聯邦國會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是由國會議員與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舉辦了相當多場公聽會，許多的專家學者被邀請到公聽會來徹底理解這 40 年來的獨裁政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委員會要去了解東德獨裁政權 (SED) 是如何取得、運用權力？當時國家與教堂之間的關係如何？媒體、輿論意見是否受制於國家？藝術家、文學家、企業如何被控制？當時調查委員會在公聽會上進行的辯論、討論，以及對政府當局做的決定，全部都公諸於世，所有德國人民都能去了解。第一次的調查委員會是從 1992 年到 1994 年，在 1994 年到 1998 年的國會又成立了第二次的調查委員會，第二次的調查委員會於 1998 年結束時，他們建議德國聯邦國會必須成立一個聯邦專責的基金會，目的是啟蒙並促進社會和解，使受害者、加害者、共謀者能彼此分享資

訊，相互了解，並共同形塑一個未來。這個基金會的宗旨並不是去追殺當時的加害者，而是給加害者第二次機會，並要在法治、民主的原則下共同形塑德國的未來。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的工作內容

剛剛所述的決議，在 1998 年正式成立了聯邦專責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目的就是為了處理東德過去的獨裁，我們的目標也獲得聯邦德國國會的同意，所以我們每年都獲得國會 600 萬歐元的資助來進行工作，目前我們有 23 為專職工作人員，其中有兩位就在現場，庫德博士及葛林堡博士。這個基金會有五項工作使命，先講其中的前三項，一為為促進歷史研究；二為促進國際處理獨裁政權經驗合作，例如我們跟前蘇聯的東歐國家有許多的合作計畫，還

會議 記錄

有西班牙也曾經歷獨裁政權，現在他們的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也是我們關注的對象；第三是我們必須喚醒人民的意識，這個意識是當我們回顧德國過去 100 年的歷史時，這會是關於德國命運的議題。數百萬的德國人民曾經活在獨裁政權下，但也有數百萬的國人曾經活在民主世界，所以我們也有機會去看看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他們是怎麼形塑他們的目標，有很多人說我們不只不要再有戰爭，也不要再有獨裁。在這個背景下，我必須要再次強調，我們的目標絕對不是報復性、清算性的作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受害者、加害者、還有那些基於某些原因沉默的人聚集起來，形塑共同的未來。最後一個想法，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活在民主的社會，越來越少人活在獨裁的世界，當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視民主為理所當然時，我們的任務就是就讓這些人理解民主與獨裁本

質上的不同，讓他們了解民主得來不易，因此「記憶」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使命。

林佳和

請葛林堡博士跟我們分享目前這個基金會在進行的工作。



格 林 堡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副執行長

透過廣泛性的轉型正義工作，我們才能確保所有的德國人民都有相同的權力做轉型正義的工作。

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的工作內容

格林堡博士

首先感謝你們友善的邀請，我很榮幸能在這裡跟大家交換意見。德國人民曾經經過兩次獨裁政權，第一次是納粹時期，第二次是東德共產主義時期，這些過去仍在許多面向影響我們的生活。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歷史學者曾說德國在處理過去獨裁的經驗是世界的專家，當然這樣的驚嘆與敬佩多少也帶著諷刺。面對過去發生的事是很重要的德國政治文化元素，在 1989 年，如耶朋曼先生所說的，許多人走上街頭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為了推翻 SED，另外一個重要的要求隱藏在黑暗中的東德檔案必須讓人民了解。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國會給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去了解東德獨裁的過程、起源、歷史、後果。我們日常的工作是相當多面向的，其中一項是處理德國近代歷史轉型處理的議題。所以全德國有非常多機構可以向我們提出德國獨裁歷史的研究計畫，這些計畫可能出於他們經費上的不允許，所以我們會提供他們資金，讓他們舉辦展覽、設紀念碑、會議討

論，或是相關的課堂研究。這個基金會的重要任務是讓社會對過去有所了解，這個工作不侷限於柏林，而是各地都在進行。透過這樣廣泛性的轉型正義工作，我們才能確保所有的德國人民都有相同的權力做轉型正義的工作。其中的一個重點是年輕世代的工作，如同耶朋曼所說，許多在學校的年輕人，他們的生命經驗中並沒有獨裁的記憶。這些年輕人對獨裁政權的認識，只是透過學校課本、媒體、報紙、或是經歷過那個時期祖父母輩的人口中得知。對年輕人的工作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讓年輕世代能更了解祖父、父母世代所經歷的社會，二是讓他們了解自由與民主的可貴。透過這個程，重要的一點是讓現代社會能應付危害民主的事。從 1990 年開始，我們就致力於學校的課本都必須有處理東德不義政權的轉型正義課題。同時，我們也關注教師是如何傳授

轉型正義的知識，也關注東德獨裁政權的經驗必須在高中畢業檢驗的考試範圍，這樣才能確保教師會把這些教給學生。我們也針對學生在學習轉型正義課程的反應做了調查，讓我們鼓舞的是，許多學生學到轉型正義是多麼重要後，有更多興趣去學習更多訊息，這帶給我們更多勇氣去處理轉型正義的工作。

林佳和

請花亦芬教授以台灣進行轉型正義工作的現況來回應兩位德國朋友的分享。



花亦芬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委員

台灣目前重要的是把威權統治教育轉成民主法治教育，這中間會有調適過程。

台灣目前處理轉型正義的狀況

花亦芬

我在這再次誠摯感謝聯絡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來台參訪，特別謝謝耶朋曼董事長及葛林堡副執行長。在以台灣的現況來回應前，我想介紹耶朋曼先生在東德時期的民運工作，這樣就能更深入討論台灣的問題。耶朋曼先生在東德時期是牧師，後來開始從事民權工作；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德國統一前，他在政府負責解除軍備及國防部；在德國統一後，他擔任國會議員，也擔任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的董事長。在東德從事民運工作期間，他受到許多東德人的愛戴、支持，導致東德共產黨想要暗殺他，在謀殺行動失敗後，他的家中卻又被裝滿了竊聽器。有這樣子在東德社會被壓迫的經驗，他經是個受害者，但今天卻是以公益、和平做訴求，帶領著統一後的德國處理德國共產黨的獨裁議題，也帶著德國邁向和解與啟蒙。副執行長葛林堡副執行長也是在東德長大。在之前的餐敘中，他跟我說他的父親先逃到西德，而還在東德的家人收到了相當多迫害。今天台灣很幸運的有兩位在東德生活過的政治迫害受害者來訪，他們是時代的見證，他們讓我們看到受害的人是如何帶領大家

會議 記錄

邁向民主社會，能夠尋求到和解與公平正義。就目前台灣目前處理轉型正義的狀況，目前已上路的是關於中正紀念堂及黨產會進行黨產追查工作。我們今天能在這順利的舉行座談會，來自於台灣絕大多數公民願意為台灣民主付出他們的承諾，願意為台灣民主繼續奮鬥。我們也知道，這個社會的政治光譜有兩個極端，他們不見得贊同我們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如何讓成熟的公民社會去面對極端、不願意走向民主化的這群人。再來重要的是希望耶朋曼董事長能給我們一些建議，從曾經被壓迫的人的角度，對這些受害者說一些話；也從人權牧師的角度對加害者說一些話；對社會大多數沉默，但對民主有信心的人說一些鼓勵的話。對葛林堡副執行長，台灣目前重要的是把威權統治教育轉成民主法治教育，這中間會有調適過程，如同前面提

到把轉型正義的歷史放進學校考試範圍，那如何規範考試範圍？占有多少百分比？如何出考題？再來，剛走出威權社會的學生們該如何調整心態，讓自己所受的教育能幫助社會走向更好民主未來？今天有很多媒體朋友在場，我相信很多媒體都關心轉型正義議題，但在台灣，媒體本身具有政治意識形態，想請教葛林堡先生媒體該如何面對處理轉型正義時紛雜的意見，他們要如何從事更有深度的報導，讓社會的民主更深化。

如何面對政治受難者與政治加害

耶朋曼

感謝您這麼鼓勵我，我其實沒您想的那麼有勇氣做自己，對別人做出建議，這不是我們能做的，尤其是對那些我只能表面了解的人、距離我這麼遙遠的人，要做出建議真的不是很容易。首先我必須要提到今天在台灣發生

的事，就我對受難者的了解，他們首要是希望被承認為曾經被不義對待的受難者；被假定某些罪名而站上法庭的人，首要是獲得法律澄清他們是被不義對待的受害者，給這些政治受難者有機會去訴說他們遭受的苦難，除此之外，還要給他們名譽上的平復，在法律上還給他們清白，還有物質上、金錢上的賠償。我們也支持舉辦活動，讓政治受難者能夠在年輕人面前說出他們曾遭受的苦難。為了讓政治受難者能訴說他們遭受的事，我們基金會與其他處理過去不義政權的基金會，如史塔西檔案局（Stasi），我們會有受難者的名單，我們會詢問這些受難者願不願意接受記者、老師的邀請，闡述他們遙遠過去的經驗，讓今天和明天生活的人不會再犯下同樣的事，讓記憶得以保存。德國近代的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結束後，威廉皇帝退位，成立了德國第一次的威瑪民

主。成立的過程相當艱辛，初期我們經歷了國家內戰，以及經濟危機、高度失業，這樣的危機讓德國人選擇了一個屠夫——希特勒來統治他們。從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主不會永遠存在，如果不持續的為更好的民主奮鬥，甚至在必要時為它抗爭，那可能民主的社會也會回到獨裁。再來，加害者的部分，面對加害者我們也要試著去對話，了解他們。我們必須去問這些加害者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些判決？為什麼要拘禁人？要試著去幫助加害者，因為他也有被揭發是加害者的恐懼，他會擔心被其他人做出當年相同的罪行，所以要告訴加害者的是正義，啟蒙他們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你們，要跟他們說「我們要的不是報復，而是你曾經將我生命中重要的部分摧毀了，我必須要告訴你我的感受，你必須要了解這曾經發生的事，我要的是你的解釋，也或許是你誠摯的

會議 記錄

道歉」。我們的人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就必須彼此互相對話、交談、結識，不然怎麼能共同生活呢？透過這樣的對話，過去是仇人的人也可能變成盟友，以我來說，過去 12 年，我已經與過去東德的高官成為了至交，整個和解過程，是 20 年前的我無法想像的，至今我仍對這樣的和解感到高興。我也想和共犯者說一些話，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人生經驗，你所有曾做過的事、說過的話、或是你沒有做過的事，對你個人都會有影響，甚至是對整個社會都有影響，重新喚起你自己最重要的基本價值，必須要公平、公義，公正。

花亦芬補充翻譯

有人認為把所有的過去都放到黑暗中，都不要處理，照著舊方法繼續過日子，繼續不人性的互相對待，但德國人選擇把燈打亮，釐清過去。

轉型正義的教育

格林堡

您剛剛提到東德在歷史課本中的角色，我們曾經做過一些調查，學生對於教育的反應是相當不同的。比較困難的問題像是學生對過去歷史人物的評價並不清楚，比如前東德總理何內克到底是 SED 的高級官員還是反對者？曾經參予反對運動的人是否也同時是加害者？學生也很難辨別前東德政權是否為獨裁，過去可能是出於恐懼所以沒有指出他們是獨裁，也或許怕會混淆到納粹的獨裁性質。這告訴我們共產、獨裁的過去是多麼重要。歷史教育是按照時序進行，從遠早到中世紀到近代歷史，這樣的方式常導致教學時數不足時，最後要教的部分就被遺漏了，這是德國二戰後碰到的教育問題。告別了過去的教育方法，新的教育的方法打破按照時序的教法，是一個跨年代、以能力建構為導向的整合

性教學計畫。在這種方法下，舉了例子來說，當我們想要研究革命的歷史，那會包含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也可能談到 1917 年的俄羅斯十月革命，或者是 1989 年東德的和平革命。從這些不同的革命中，學生可以了解這之間共同點及差異點。在高中畢業會考裡，就會有類似的議題，例如：你是如何評價一些歷史上的革命？此革命是否可以和另一個歷史革命相互比較？必須拿來相互比較嗎？為了進行這樣整合式的教育，我們必須有相當能力的教師，能夠以跨時代的教法教導學生，在這一方面，德國是相當不錯的。在德國的大學中，我們有各式關於近代、各時代歷史的教授講座，但要找到專精於東德歷史的講座仍是相當困難。把東德歷史融入大學教育中是很重要的，只有在大學生清楚了解東德歷史後，他們才有能力把這些資訊傳給中學生、小學生。關於媒體的議題，我必須告

訴你，在德國，媒體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他們傳播的內容、方式都有不同的報導角度。我們可以說，媒體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不同的意見，本來就是民主化過程中正常的現象，我認為是好的，看看東德當時的狀況，媒體報導相當一致，像是如果某位共產國安局的高官升任，那媒體就只會接著報導他們的事蹟。前東德國安局，也就是大家所知的史塔西檔案局，它只是東德的一部分，它只是東德統一社會黨的執政工具而已。為了要公平對待東德人民，對於東德不義政權的追究、處理，不能簡化成對國安局（史塔西）的追究，更重要的是誰站在國安局後面下命令，很清楚的，就是 SED。我們不只去了解當時的統治者做了什麼，必須也要了解一般人民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過去的歷史不是黑白的，對大部份人來說是灰色的。對媒體來說，重要的任務是讓時代的見證者去訴說他們經歷的

會議 記錄

事，無論他們是站在什麼立場、哪一個方面，這些故事都應被媒體訴說。

媒體提問

記者 1

耶朋曼在 2009 年獲獎，而這個獎是針對納粹及東德共產政權，而昨天有特定群眾在 101 舉納粹旗及五星旗，台灣的人民對此舉動相當反感，但這些人認為他們享有言論自由。而在德國、甚至是歐洲，這樣納粹的情況是被禁止的。我想問德國如何界定自由的底線？因為納粹肯定就不是在自由的範圍內了。當國家、社會面臨威權入侵時，有沒有防衛的機制？

耶朋曼

民主是多元的，是五彩繽紛的，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意見，每個人都能私人、公開宣傳自己的理念。但社會對此有一個極限，

你不能去顛覆社會的共同基本價值。外面看到的抗議對我們來說很正常，但有一個例外就是納粹旗，如果有人否定、拒絕承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必須要被懲罰。想要去破壞法治、破壞民主的人，必須被禁止，必須被懲罰。因此，如果有人抗議拿納粹的旗子，會立即被收走，並被懲罰。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能說想說的話，但如果要公開抗議，那你就要準備好跟你所抗議的人對話，所以剛剛抗議我們的人，我們很願意與他們溝通，從他們的旗幟看來，他們應該是對我們的工作與我們的歷史不夠理解，正因如此，我們很願意與他們對話。我們很樂意與他們交流、對話、甚至是爭執也可以。從這裏的觀察我們也能明顯的判斷，這些人不想和我們交流，不然不會藏在布屏的後面。或許我以一句德國前總統高克的話來做結束，前總統高克與現任聯邦總

理梅克爾都曾被要求下台，甚至被要求判死刑，高克總統事後說我們很樂意跟他們溝通，但只有在彼此能夠交談前提下。

記者 2

在台灣推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受到國民黨許多的反對、抗議，繼例如剛剛外面的抗議。想請耶朋曼先生分享如何看待來自國民黨的抗議？該用什麼角度來看待這些抗議？

耶朋曼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如果今天沒有這些抗議的人，我反而會覺得奇怪，只要不是在暴力的手段下，我們都願意溝通。

花亦芬補充翻譯

如果他們不是用公開的抗議方式，那私底下可能是用暴力的方式，那其實是更不好的。

記者 3

台灣在近期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台灣也會成立類似德國這樣的基金會，德國在轉型正義

這方面，在收歸了不當黨產後，在不當黨產的處理、應用上有沒有能讓台灣借鏡的地方？另外，東德共產組織有一些青年組織，台灣也有類似像救國團這一類的組織，在處理青年組織方面，德國有沒有哪些經驗可以讓台灣學習？

耶朋曼

黨產的部分，如果是違法取得，或是自己制定法律來奪取的，那這些必須還給國家，這是在一黨執政時會發生的情況，另一方面，如果黨產是來自於人民捐贈、稅收，只要是合法合理取得，那國家就不能把這些財產拿走。重點是討回黨產的過程，都必須依照法律、法制進行。德國在解散政黨方面是相當困難的，像是 SED 後來演變成的政黨 PDS，要證明他們有顛覆現有體制是很困難的，儘管有些人是如此控訴，但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根據德國聯邦法律的規定，要解散政黨是非常困難的。